

论罗斯福与马歇尔在欧洲战略上的分歧

熊伟民

1941年底至1942年7月,罗斯福与马歇尔在欧洲战略上的分歧,是围绕着美军首先在北非登陆作战,还是坚定不移地执行“波列罗——围歼”计划为中心而展开的。他们之间的分歧,与英、美、苏三国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搅拌在一起;尤其是和英国坚持的战略争论搅拌在一起,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第二战场开辟的重大问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方面觉得美国参战使他们“终于赢得了胜利”^①,但另一方面担心“美国的战略思想可能有急剧的转变——可能放弃先前同意的‘首先对付德国’的策略,而把全部力量集中用来对付日本。”^②因此,建议英、美首脑就战争战略问题举行会谈,得到罗斯福的同意。

丘吉尔赴华盛顿的一个直接目标,是希望得到罗斯福“向法属北非和西非推进政策的支持”^③。1941年12月22日,丘吉尔到达华盛顿,当晚就与罗斯福进行了会谈。丘吉尔提出“英美在法属北非进行干涉的计划”^④,马上得到罗斯福同意。第二天,丘吉尔电告战时内阁和参谋长联席委员会,说他与罗斯福关于英美联合进攻北非的讨论“不是要不要去进行,而是怎样去进行”的问题^⑤。

美国一参战,罗斯福就把美军在欧洲作战的注意力放在法属北非,并非偶然。罗斯福总统对法属西北非的注意和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1940年夏天。

1940年4月9日,希特勒大举入侵丹麦,打破了大战以来西线的沉寂。德国强大的装甲兵团,席卷西北欧,两个多月时间,占领丹麦,攻陷挪威,横扫比利时、荷兰,打败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英伦三岛面临德国入侵的危险。欧洲战场战局的这种急剧变化,使美国人民“目瞪口呆”^⑥。马歇尔和陆军参谋部官员担心英国崩溃,最危险的是“德国和意大利迫使英国和法国的海军中立,或是控制部分或全部英法海军。”^⑦那样,欧洲法西斯就会对西半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他们主张减少对英国的援助,在太平洋和远东对日本采取守势,集中全力,保卫西半球^⑧。但罗斯福坚决支持和援助英国的政策,建议用美国的海空军担任从摩洛哥到格陵兰一线的海上封锁任务,考虑把摩洛哥作为来自西半球的物资供应基地和进攻欧洲大陆的跳板^⑨。1940年8月15日,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在白宫私下交谈时表示:“如果我们被卷入战争,我们就必须抢先在敌人的海岸登陆——例如:非洲的西北海洋。”^⑩

1941年春,罗斯福接连不断地接到来自伦敦和维希的报告,报告指出:种种迹象表明,德国将打进法属非洲,从而把罗斯福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了西北非。罗斯福似乎一直在考虑派美国军队远征法属非洲和北大西洋诸岛。他指示海军陆战队作好进攻法属西北非和亚速尔群岛的准备。5月27日,罗斯福发表广播演说,公开宣称:亚速尔群岛、佛得角、达卡尔决不能落入德国之手。马歇尔则认为,美国武装力量尚未动员和组织起来,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强

大，因此，不宜过早卷入战争，美国应把战略重点放在西半球，而且，他反对美军在西半球以外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为了防止德军对西半球的可能入侵，最有效的办法是掌握巴西东北端的一些海空军基地。马歇尔积极策动巴西和美国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并请求罗斯福对巴西总统施加个人影响，但遭到总统拒绝。

1941年10月，蒙巴顿出访美国，向罗斯福报告英国在未来几个月里的行动计划和准备。访问结束时，总统要蒙巴顿转告丘吉尔首相：一旦贝当、魏刚与英美合作，他对美国占领北非就感兴趣。蒙巴顿回到英国向丘吉尔汇报时指出：罗斯福对法属北非、达卡尔和大西洋岛屿“抱有特别兴趣，这种兴趣不仅是从美国的国家立场出发的，而且，也是从罗斯福个人的思想方式出发的。”^①

在美国正式参战和军事力量动员起来之前，罗斯福总统准备在西北非采取军事行动，不是从单纯的军事观点考虑西半球的安全。如果仅仅为了西半球的安全，那么，象军方所建议的那样，在巴西东北端扩大防御就能提供有效的保证。很显然，罗斯福是在寻求一种军事以外的目标。罗斯福要保证支持英国，但从美国的整体上看，广大公众还没有为支持英国而作出重大牺牲的思想准备，他急于使美国公众对德国的威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甚至接受一种冒险的政策——包括美国最终成为参战国。但是，只有当全国人民都感觉到战争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才能为美国最终卷入战争提供适当的心理基础和心理准备^②。

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同意尽快进攻北非，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美国虽已参战，但士气问题仍是军事政策的一个中心要素。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全国人民还没有为进行世界战争而团结起来，甚至面临日本军国主义的猛烈进攻而不知所措。人民群众也缺乏一种准备献身的精神。最使罗斯福烦恼的是大多数人对于对德战争的忽视。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民意测验显示“约占人口25%的‘和平’集团，赞成马上同德国媾和……甚至对太平洋战争也没有显出普遍热情……只有59%的调查者愿意进行一场全面对日作战。”^③因此，罗斯福希望尽可能早和尽可能快地把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欧洲作战，鼓舞美国人民对战争的热情，尤其是对德战争的热情，同时向盟国，特别是向苏联，造成一种美国正在全力以赴从事作战的形象。正如总统自己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北非战役“对士气、对给这个国家的人民一个正在进行战争的感觉……对美国军队穿过大西洋在某处投入战争，都是非常重要的。”^④从追求这种政治目标出发，美军在欧洲发动的第一次攻势只有两个要求：第一，尽可能早地投入战斗；第二，避免战术上的失败。这时，英军正在利比亚沙漠发动“十字军”攻势，开始进展顺利。英美领导人估计，一旦英军发动的“十字军”行动取得胜利，法国就会邀请英美军队进入北非。这样，英美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控制法属北非。

马歇尔则反对美军在北非作战。他虽然支持既定的“欧洲第一”的战略决策，但是，北非作战“几乎引不起他的兴趣”^⑤，他向罗斯福列举了许多后勤方面的问题，并且特别强调，北非战役会分散盟国的力量，把盟国拖进地中海，而地中海对于最后打败德国来说，是一个非决定性的战场^⑥。

由于马歇尔等的反对，同时英国在北非发动的攻势是否成功，法国是否合作等问题也不能完全确定，因此，阿卡迪亚会议没有就入侵北非的“体育家”计划作出最终决定。不久，传来英军在北非作战失利和贝当、魏刚拒绝在北非和英美合作的消息，这样，罗斯福和丘吉尔只得同意把“体育家”计划推迟到5月以后再作考虑。

应该指出：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马歇尔虽然不赞成美军在北非作战，但对美军在欧洲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思想上还是模糊不清的，对待英国的边缘战略，提不出可供选

择的计划和方案，所以，关于1942年英美在欧洲的战略计划备忘录中，仍然反映出了英国边缘战略的思想^{①7}。

2 罗斯福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对“体育家”计划的支持，1942年1月和2月盟军在太平洋和东非前线接连不断的失败以及盟国在战略计划方面的混乱，不仅引起了马歇尔的忧虑，也引起了参谋部僚属的不满。他们把失败归之于英国的边缘战略，认为英国执行边缘战略的目的是保护他们在中东和其它地区的利益合法化。英国战略的最大麻烦是明显地获得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美国作战计划处的约瑟夫·史迪威的抱怨，就集中反映了这种情绪。史迪威说：“英国佬的话，他〔罗斯福〕总是听得进去，而我们总是靠边站。结果总是塞给我们成堆的坏主意和没有经过好好考虑的计划……英国佬要我们打，要我们承担义务。他们一点也不想想今后我们会怎么样，因此，他们要把他们的担子卸到我们肩上。所以，他们总是坚持要快，而他〔罗斯福〕也一样，心里发痒……一股劲地催我们干，听不进所有顾问们考虑好的意见。”^{①8}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要求史迪威“列举65条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应该执行‘体育家’计划，以防止按英国方案而无谓消耗军事力量。”^{①9}在这种背景下，马歇尔觉得需要制定一个对英国战略计划的选择方案，防止盟国资源的浪费，夺取军事战略和计划方面的主动权，把总统争取过来。

马歇尔指示艾森豪威尔就美国的全球战略计划展开研究。2月28日，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递交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尽快打败德国，支持俄国人的抵抗，英美两国应该马上制定一项在西北欧行动的确切计划，英国不仅是主要的参战伙伴，而且也是对德国发动有效的地面和空中攻势的唯一基地^{②0}。3月25日，艾森豪威尔就他对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的论证和研究报告了马歇尔，并且说，“作战计划处进一步认为，除非这个计划被采纳作为我们努力的最终目标，我们就必须从大西洋转移我们的方向，尽可能快地全力投入对日作战。”^{②1}

艾森豪威尔的分析，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美国陆军对英国边缘战略模棱两可态度的结束，正确反映了马歇尔的战略主张，得到马歇尔、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陆军防空队司令阿诺德的支持。

3月5日和25日，马歇尔曾两次向罗斯福总统阐述英美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作战的优越性，总统逐渐对该计划发生了兴趣，但同时也担心要实行该项计划非常困难。

4月1日，在作了进一步论证和修改的基础上，马歇尔就横渡海峡作战的计划正式向总统递交了备忘录。备忘录宣称：西欧是唯一有利于英美发动第一次大攻势的战场。备忘录建议：英美最终集结48个师、5800架飞机用于渡海作战。这样多的兵力和物资装备，估计要到1943年4月方能集结起来，因此，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只能从1943年4月开始。备忘录建议：如果遇有下述两种情况之一，俄国抵抗面临崩溃，或者德国兵力完全被拴在东方，且士气低落，1942年就要在法国沿海集中力量进行一次小而快的登陆。备忘录要求：从1942年秋天起，英美对法国沿岸实行炮击、不断扩大对西欧的空袭^{②2}。马歇尔备忘录的基本出发点是：选择英国为基地，集中兵力和装备，横渡英吉利海峡，对西欧发动强大攻势，直插德国心脏。1942年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兵力和装备的集结，为来年春天的进攻作好准备，1942年可能进行的登陆作战却是次要的考虑。罗斯福在仔细阅读备忘录、向参谋长提出若干问题后，批准了备忘录。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赞成英美在北非作战，现在为什么又转而同意到西欧作战呢？其主要原因，仍然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首先，应付国内舆论的压力。1942年头3个月，英美在战场上的形势十分糟糕。在利比

亚沙漠，奥金莱克吃了败仗；在大西洋，潜艇战使英美两国船舶的损失持续上升；在太平洋，英美荷三国军队全面退却。美国国内要求在太平洋采取行动的呼声不断高涨，对政府无所作为为极端不满，对国家领导人失去了信心，甚至要求“新的、年轻的人走到岗位上去。”^②美国国内的这种反映和要求，给罗斯福形成极大的压力，使他寻求在欧洲采取积极而迅速的军事行动，但要他马上进行北非战役已不可能，这就需要找一个替代的方案，马歇尔备忘录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③。

其次，鼓舞苏联继续作战，防止英苏就苏西部边界达成协议。1942年上半年，苏联战场的形势仍然十分险恶。希特勒在进攻莫斯科遭到失败后，集结大量兵力，准备发动更大的攻势。苏联能否在1942年顶住德国的进攻，是值得怀疑的。美国担心苏联与德国单独媾和，并有迹象表明，这种忧虑并非多余。1942年2月，斯大林在一次有关苏德战争的讲话中，没有提及英美盟国和它们的物资帮助，对战争批评方面对希特勒个人的谴责超过了对第三帝国的诅咒。由于苏联首脑在提法上出现了重大变化，有人以为这是苏联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的一个信号^④。3月7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马歇尔将军报告了美国陆军驻开罗观察员费勒斯发来的电报。费勒斯声称：“一位与他有接触的俄国军官强调，联合国家需要建立一条西线来使德国人两线作战，从而减轻俄国陆军所受的压力，否则，俄国人同德国人单独媾和并不是不可能的。”^⑤在边界问题上，苏联参战以来，不断给英国施加压力，要求英国承认苏联在1940年确立的新边界。丘吉尔在接二连三失败的打击下，为了争取与苏联的进一步合作，鼓励苏联继续坚持打下去，倾向于与苏联签订条约，承认苏联的新边界。3月7日，丘吉尔写信给罗斯福，要求英国能“尽快自由地与斯大林签订条约”，由于战争形势日益增加的严重性，使丘吉尔觉得“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在俄国遭到德国攻击的情况下，不应理解为是对俄国占领的边界的否定。”^⑥罗斯福不愿意在战时处理欧洲棘手的边界问题，希望以答应开辟第二战场来鼓舞苏联继续对德作战，同时，把苏联的视线从边界问题上转移开去^⑦。

再次，就马歇尔备忘录本身而言，也并非无可取之处。形势的发展，1942年也许会出现英美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一种情况是德国被拴在东方，使渡海作战变得相对容易；另一种情况是苏联受到极大压力，从而需要英美采取紧急行动。备忘录提出在法国沿海发动小规模攻击和不断增加的空袭，也许能满足国内宣传的需要。罗斯福接受马歇尔的备忘录，至少他接受了一个保证美军发动进攻的计划。

不管罗斯福以什么理由接受马歇尔提出的备忘录，其基本出发点主要是建立在1942年美国地面部队在欧洲迅速采取军事行动的基础上的，这与马歇尔备忘录的基本出发点相去甚远。所以，当英国人反对1942年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坚持在北非发动进攻的时候，罗斯福的立场将再次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美国在欧洲第一次攻势的“体育家”计划的复活。

从罗斯福接受“波列罗——围歼”计划到6月19日丘吉尔第二次来华盛顿会谈，
3 罗斯福和马歇尔在对待美国的第一次攻势问题上，两人态度又有明显的变化。罗斯福总统对“痛击”已发生动摇，再度倾向于“体育家”。马歇尔则开始对“痛击”抱坚决肯定的态度，因为形势已经把马歇尔推到了这样的地步：1942年必须行动，不是“体育家”就是“痛击”，没有其它选择的余地。虽然“痛击”并非是马歇尔注意的焦点，但如果同意“体育家”，就意味着在英国集结兵力装备和1943年大规模入侵西欧将被推迟，甚至有可能被取消，因而坚持1942年横渡海峡作战，就是保护整个“波列罗——围歼”计划。

6月17日下午，罗斯福召集马歇尔等在白宫开会。罗斯福声称：他“一方面同意渡海作战，但另一方面又怀疑1942年能不能实现。”他说，主要目标是1942年能作些什么来帮助俄国

人。这样，他“正在考虑两个取代横渡海峡作战的计划。第一，北非作战；第二，派遣美军到中东，直接支援正在埃及——利比亚边界对德军作战的英国军队。”^②马歇尔和史汀生对总统建议进行北非作战深感吃惊。马歇尔坚决反对在北非作战，认为它缺乏取得胜利的几个必要条件，即：海上运输、护航船只和空中支持。马歇尔最关心的是：“这个行动将把美国拖进一个全新的、没有决定意义的战场，耽误对大陆发动关键性的进攻并在英国筹划的军队集结工作。”^③

6月19日，丘吉尔到达华盛顿。在与总统的单独会谈中，丘吉尔虽然保证他对1943年横渡海峡作战仍然承担义务，但对“痛击”计划则发起猛烈攻击，他建议把“体育家”计划作为替代方案。6月20日，丘吉尔把他的考虑和建议写成备忘录交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基本上同意了丘吉尔的意见，因为“丘吉尔的主张总是打中了总统的心意。”^④而“体育家”计划“正是总统闷在心里的大法宝”^⑤。6月21日，罗斯福、丘吉尔和他们的参谋长们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丘吉尔以雄辩的口才阐述他对“痛击”计划的反对意见，但遭到马歇尔有礼貌、然而却是十分有力的回击，双方僵持不下。罗斯福在表面上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把球踢给丘吉尔，让丘吉尔去承担与马歇尔激烈争辩的责任。由于传来英军在托卜鲁克失守的消息，会议的注意力很快转向了中东。在会谈行将结束时，罗斯福提出把美国军队开往中东接管从德黑兰到亚历山大里亚的整个防线。对罗斯福这种节外生枝、分散和浪费美国资源的建议，马歇尔很不满意，他拒绝对此加以讨论，愤愤地走出了办公室。

6月23日，马歇尔交给总统两份备忘录，第一份是对20日首相给总统的备忘录的回答，阐述他对“痛击”计划的立场，第二份阐述他对美国出兵中东的看法。在第一份备忘录中，马歇尔承认“1942年进攻欧洲大陆所面临的困难，令人望而生畏，但相信不是不可克服的”。他认为“体育家”是替代“波列罗”的跛脚方案，它将从根本上分散“波列罗”力量，从而使美国应该贡献它最大资源的主要打击遭到削弱。更为糟糕的是，即使“体育家”取得胜利，也不会使德国从俄国前线撤走飞机、坦克和部队^⑥。在第二份备忘录中，马歇尔指出：在如此遥远的地方采取军事行动，后勤方面的分散和浪费是巨大的。中东、北非虽属重要。但离德国还很遥远。马歇尔提醒总统：“您谙熟我的意见，我认为主要战场在西欧。这里是我们自己和英国军队能够一致努力把战争推到德国人身上的唯一地方。中东的大规模冒险，会使美国在西欧对这次战争所作的决定性贡献成为泡影，鉴于此，我反对这一计划”^⑦。6月25日，双方举行最后会谈，同意1942年行动是必要的；继续抓紧进行“波列罗——围歼”的准备工作，如果“痛击”计划在1942年不能实现，就用“体育家”计划来代替。

丘吉尔从华盛顿回到伦敦后，继续为“体育家”计划而努力。7月8日，他写信给总统说，使“痛击”成为可能的条件好象不会出现，同时宣称，法属北非为1942年减轻苏联负担提供了最好的机会^⑧。马歇尔已清楚英国当局对“痛击”不感兴趣，现在他又从英国驻美联络官迪尔爵士那里获得确切消息，丘吉尔已经决定恢复“体育家”计划。被激怒的马歇尔建议取消1942年在欧洲战场的任何行动，把美国的主要力量转到太平洋去。但是，罗斯福总统压制了他的这个想法^⑨，并决定再派马歇尔、海军部长金氏和总统顾问霍普金斯到伦敦与丘吉尔举行会谈。总统在给三人的指示中，提出了供他们选择的方案：或是“痛击”、或是“体育家”、或是出兵中东，并特别强调指出：美国地面部队必须在1942年投入战斗^⑩。马歇尔三人到达伦敦后，与丘吉尔的讨论再次陷入僵局。7月22日，霍普金斯把会谈情况电告了总统。罗斯福马上回电，说他“对伦敦会谈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并不感到惊奇”^⑪，他重申他们离开华盛顿时给他们的指示：必须制定1942年有美国地面部队参加的对德作战计划。他建议按下列秩序制定计划。

〈1〉英美联合进攻法属北非；〈2〉完全由美军进攻法属摩洛哥；〈3〉在挪威北部联合行动；〈4〉支援埃及；〈5〉出兵伊朗^⑨。第二天，罗斯福又向霍普金斯发出一封更详细电报，重申他“赞成1942年进行北非作战，即使（他坦白地承认）这样做必须暂时把‘围歼’作为主要目标放弃掉。”^⑩在总统的这种压力下，马歇尔作出让步，同意是年晚秋英、美在北非采取联合行动，但他还有重大的保留，认为最终决定要等到9月15日才能作出。罗斯福不顾马歇尔这个保留意见，他请霍普金斯转告丘吉尔，他感到高兴的是决定已经最后作出了。

回到华盛顿后，马歇尔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争取“波列罗——围歼”计划的执行。7月30日下午，李海将军主持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马歇尔建议1942年实施“体育家”计划和取消“痛击”行动再推迟一周，这样，参谋部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是日晚上，罗斯福则明确告诉马歇尔等人：他“作为总司令，已经作出了执行‘火炬’（进攻北非的代号改为‘火炬’）的决定，现在轮到他们的是执行、贯彻它。”^⑪

罗斯福与马歇尔在欧洲战略上的分歧，实质上是政略与战略的分歧。

4 罗斯福总统既是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又是美国三军总司令，这种双重身份的地位，决定他在指导战争方面带有比军方更直接、更浓厚的政治色彩。选择什么样的战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他不仅需要考虑到军事方面的效果，而且要考虑国内舆论、反对党的态度以及与盟国之间的关系。1942年，在各种困难和压力面前，他所需要的是在欧洲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无论是北非、挪威、西欧或中东，只要把美国地面部队投入同德军作战的战斗，至于这种行动在军事上是不会产生最佳效果，那是次要的考虑。当然，在所有这些行动的选择中，北非作战最适合他的需要，这是他长期注意和偏爱的目标，并与丘吉尔一拍即合。

1942年是美国国会选举年，罗斯福“非常担心”他的政治反对派会在11月“控制大选”，他在极力要求马歇尔进攻北非时，曾举起双手说：“请在大选前实施进攻吧”^⑫。由于10月份发动进攻要冒更大的风险，没有成功的把握，马歇尔提出在11月大选后实施进攻，结果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失去87个席位，在参议院失去10个席位，罗斯福总统控制的大多数票额几乎所剩无几。选举后的第5天，即11月8日，在令人沮丧的结果统计出来之后，马歇尔派副官弗兰克·麦卜锡去告诉白宫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说美国陆军第二天将在北非登陆，厄尔利气势汹汹地说：“你现在倒跟我说起这个来了，你这个兔崽子，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在一星期前登陆？”^⑬

横渡海峡作战还是进攻北非，外部的阻力主要来自英国。英国是战时美国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实行合作的支柱和基础，同时，也将是战后美国不可能踢开的伙伴。英国比美国先进入战争，作战经验比美国丰富，在战略问题上，英国自认为比美国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况且，1942年和1943年英美在欧洲的联合作战计划，其人力和物力绝大部分必须由英国提供，没有英国的合作，美国要在欧洲进行任何稍具规模的作战行动都是不可能的，因而英国的意见和看法不能不受到尊重。罗斯福作为国家首脑和政界领导人，在维持与盟国的友好关系方面负有主要责任，他的讲话、表态、选择任何决策，都需要反复斟酌和尊重盟国的意见，在英国坚决反对1942年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的情况下，选择“体育家”计划也许仍不失为一种援救苏联的办法。

马歇尔则不同，他作为陆军参谋长，是美国指挥军事作战的主要领袖。他的责任是在军事上为总统提供战略计划和战略选择方案，保证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打击和消灭敌人、赢得战争的胜利。至于这种战略是不是有利于总统在政治上的宣传和竞争，不是马歇尔在战略上考虑的重点。职业军人不参予政治，这是美国军队的历史传统，也是美国议会政治的传统。马

歇尔自己曾说过，政治上的因素是国家首脑——总统和总司令的事情^④。有人曾经问过马歇尔，他在服役期间政治上属于哪一党，他诙谐地说：“我父亲是民主党人，我母亲是共和党人，我是个圣公会教徒。”^⑤马歇尔在战略方面的考虑，主要受战争规律和战争原则的制约。他认为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是能够尽快打垮德国的最佳选择，所以，他坚定地维护“波列罗——围歼”计划。

罗斯福与马歇尔在欧洲战略上分歧的最终解决，是罗斯福总统压制了马歇尔参谋长的主张，选择了“火炬”行动作为美国在欧洲发动的第一次攻势，其影响是巨大的，它使英美两国军队长时间陷入北非和地中海，严重地阻碍了“波列罗——围歼”计划的执行，大大推迟了横渡海峡对德发动的主要进攻，从而拖延了在法国西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间，也延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进程。

注释：

①④⑤ (英)温斯顿·丘吉尔：《伟大的同盟》，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版，第916、1000、1001页。

②③⑩⑬⑭ (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译版下册，第3、190、188、211、212页。

③⑪⑫⑬⑭⑮⑯ (美)K. W. 斯迪尔：《1942年第一次攻势》，布卢明顿和伦敦1973年版，第53、35、5、49、84、150、151页。

⑥ (美)内森·米勒：《罗斯福正传》，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79页。

⑦⑧⑲⑳㉑ (美)莫里森·马特洛夫和埃德温·斯内尔：《联合作战战略计划：1941—1942》，华盛顿1970年版，第12、14、184—187、277、278页。

⑧ (美)肯特·格林菲尔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再思考》，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中译版，第62页。

⑩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上册，第29页。

⑭ (美)波格：乔治·C·马歇尔：《考验与希望1939—1942》，纽约1966年版，第288页。

⑮⑯⑰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的对外政策：1933—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版：第465、466、466页。

⑱⑳㉑ (美)亚当斯·亨利·赫契：《权力的见证：海军上将威廉·D·李海传记》，安纳波利斯1985年版，第185—186、187、186页。

⑳㉑㉒ 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和小阿瑟·J·史密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和战略：文献与评论选编》，纽约和牛津1979年版，第193、222、224页。

㉑㉒ (美)马尔科姆·C·莫尔斯等：《艾森豪威尔文集：战争年代I》，巴尔的摩和伦敦1971年版，第149、207页。

㉑㉒㉓ 马克·A·斯托勒尔：《第二战场政治》，伦敦1977年版，第36、37、38页。

㉓ 转引自朱贵生、华庆昭：《第二战场与英美的战略企图》，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5期。

㉑㉓ (美)沃伦·F·金伯尔：《丘吉尔和罗斯福通讯全集》，普林斯顿1984年版第1卷，第394、520页。

㉑ (美)波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政治及其战略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㉑ (英)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中译版，第227页。

㉑ (美)波格：《乔治·C·马歇尔：胜利的组织者：1943—1945》，纽约1973年版，第315页。

㉑ (美)小埃德加·普里尔：《十九颗星》，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译版，第340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